

# 库切书写的文类策略:虚构与非虚构的杂糅文本

蔡圣勤

**内容摘要:**库切作为后现代与后殖民交锋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创作和文学批评都非常别具一格。其文学思想中孤岛意识的表达方略之一就是杂糅虚构与非虚构文本,使“真”与“幻”、“虚”与“实”全面交织,以应付文字审查制度和帝国意识的责难。其生存状况的“夹缝性”和文化选择的两难性通过这一方略亦虚亦实而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其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强权的信念。

**关键词:**库切 文论思想 文类策略 杂糅文本

**作者简介:**蔡圣勤(196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批评学,库切文论思想研究。该论文为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库切文学思想中后殖民主义的右翼性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ZS011】。

**Title** The Genre Strategy of Coetzee's Writing: Hybridization of Fiction and Non-fiction

**Abstract** Coetzee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modern writers when postmodernism meets with the postcolonialism. His novels and critical works are all very special and each of them is unique. One of this writing strategies to express “the Island Consciousness” of his his theoretical thoughts is hybridization of fiction and nonfiction, which overlapping “the real” and “the unreal;” “the fictive” and “the fact” to confront the censorship and censure from inner imperial consciousness. The situation of “living in between” and dilemma of cultural identity are expressed with this strategy to criticize wester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hegemony.

**Key words** Coetzee; literary criticism thought; genre strategy; hybridized text

**Author** Cai Shengqin, Ph. 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caisqq@126.com

如我们所知,后现代主义作品大都具有较强语言实验性甚至是话语游戏。后现代主义以“语言”为中心的特色,证明文本的意义实际上是个语言表达问题。在后现代的文本中,现实只不过是语言虚构的假象,是语言所创造的”(Lyotard 73)。由于语言本身的虚构性,可致使一切由语言表述的文本都不可避免地划入虚构的范围之中。传统小说是典型的虚构作品,它以虚假的语言虚构出虚假的故事去反映本身就虚假的现实,从而把读者引入到双重的虚假中。而后

现代小说家的创作特色及书写的主要任务由以前的虚构故事及其情节,转变为跳出故事就是去揭示这种欺骗,把现实的虚构的虚假也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随着这种创作的倾向性的发展,伴随发生的就是以戏仿或讽仿为主要范式,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反思、解构和颠覆。由于语言文字的虚构性,使人容易产生了一个结论,即“一切使用语言进行表述的文本都可能具有虚构性”(凯尔纳 224)。后现代理论的这一阐述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冲击是巨大的,它甚至让人开始怀疑一切我们所固有的知识体系,包括历史、文化、政治、新闻、法律等等。在此之前,除了文学承认自身的虚构性,其他学科则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对“本真”或“终极真理”的追求,可是如果承认了语言的虚构性,也就是承认了自身学科也具有虚构性,从而动摇了为之奋斗终身的本根。

### 一、虚构的语言和虚构的文本

正是由于“语言游戏的多元性和异质性”(Lyotard 73),在由语言表述的文本中,虚构之中有真实,真实之中有虚构。真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构成的文本本身。因此,传统的对虚构与非虚构的划分(Fiction and Non-fiction),无法满足文本的这一特征。库切,作为一个学界的先锋,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大胆地对这一“先锋性”的理论进行了实验。他创作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动物的生命》等就是这样的杂糅了虚构与非虚构的作品,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库切虚构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作家,这位澳大利亚的作家作品不多却很有影响,这有点像库切本人。也许我们可以把伊丽莎白视为库切的部分替身,的确有许多因素给人这种暗合,包括早年的欧洲经历,包括作为在英语世界中的边缘身份的作家,以及对西方基督教主流文化所持的相似的批判态度,对于文学作品获奖的态度(库切的态度低调,数次未出席文学奖的颁奖),甚至由于热爱动物、为动物的生存呼吁、和自身的素食习惯等。当然,科斯特洛毕竟是库切虚构和塑造的一个人物,也有很多的不对等关系,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等等,可这也恰是库切的高明之处。他让科斯特洛走向前台,言他所言、言他未所言、言他所不能言。充分利用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和复调,形成了多声部的杂音,表现作品中作者的“外在立场”(Exotopie)。这样使他对世界的观察比她更透彻看法更有分寸。库切让伊丽莎白去替他发言,让她去面对驳诘、冷落、孤独和各种尴尬场面。借着伊丽莎白的那股偏执高傲的气势,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对理性的批判引向极致。

虽然,这部作品形式上如一部小说,用虚构的人物将八个演讲串起来,整体上看,是一个有情节,有场景的故事,可内容上却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点,而且还是一部文论集。更为令人惊异的是,这部文论集的部分内容,有几篇在该“小说”2003年出版前已经发表过,如1997年的《什么是现实主义?》<sup>1</sup>、1998年的《小说在非洲》<sup>2</sup>、1999年的《动物的生命》<sup>3</sup>和2001年的《非洲的人文学科》<sup>4</sup>,更

有2007年的《灾年日记》等等,这一特征与其他的文论集如《陌生者的海岸》、《内部的工作》(Inner Workings)的特征相似。内容中关于文学的如《什么是现实主义?》和《小说在非洲》都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的本质问题。文学之于作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文学的意义以及功能的局限,创作心理机制中主体伦理的保持和丧失问题,等等。在作品第三第四个章节里,把《动物的生命》分成两个部分,并分别加上了小标题:哲学家与动物、诗人与动物。尽管从主题上看似动物权力的保护问题,实际上,思想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去看待生命、去看待人性本源,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在后面的几个章节了,库切集中讨论了理性问题,爱欲问题,邪恶问题,神学和信仰问题,都是与文学的书写相关。

很多人对这部作品的文类归属问题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他是小说,它有虚构的人物主线、滑稽荒诞的场景设置,“具备了小说的——哪怕是最传统、最普遍的小说——一些不可或缺的要害,如人物(有主有次)、如地点(从美洲到欧洲,从陆地到船上),如事件(女主人公不正常的性爱经历,她儿子的艳遇)。而这些因素是实在的,更是虚构的”(北塔 282)。有人认为它是非小说(non-fiction),也有人认为它是超小说(meta-fiction)、有人认为它是非非小说(non-non-fiction),更有人认为它是一部演讲集而已,而且是一部哲学演讲集。以至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在2003年评选年度最佳英文小说时,评委会的专家们狠心地把它从预选名单中给剔除了,说它根本不是小说。对于读者的质疑和不解,库切没有任何回应,也没作出任何辩解。

当然作为学者兼作家的库切,比谁都明白,小说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叙述而不是论述,是叙述的方式决定了思想的存在。历史上也有许多作品借人物之口表达思想,如狄德罗《拉摩的侄儿》等。小说家借人物之口表达思想并不奇怪,早在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到了二十世纪萨特和加缪等存在主义的思想家的作品中,都有夹杂着类似的说理的段落。但它们都没有改变从整体上文类的归属,可是,库切的这一特殊表现,不但演讲的篇幅较长,主题间变换的跳跃性较大,而且它们曾经独立成篇,并已经公开发表过。至于是否是借人物之口来表达思想都是个问题。因为,作品中主人公伊丽莎白否定了记者要她谈谈自己的“主要思想是什么?”的问题,而答道:“作家有义务带来思想吗?”(13)这些特征更加凸现了这部作品的实验性,可以说是对传统文本分类学的一次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没有哪一部在艺术上可能达到库切的高度,因此,也可以说,将虚构与非虚构杂糅,是库切的一次新的尝试,更是一种书写策略。这种策略,不仅体现在这部作品本身,在2003年诺贝尔奖授奖的答谢辞中,库切的演讲《他和她的人》也是这个策略的体现。《他和她的人》与其说是个演讲词,不如说他又讲了一个故事。2005年的新作《慢人》中,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人物又“客串”进来了,实在让人虚实难辨。这种虚与实的交织,更加体现在库切长期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即关于传记和自传的杂合上了。

## 二、自传与传记中的虚构与真实

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库切对传记的研究。库切的对传记的研究不仅数量多,涉及面广,人物复杂,自己还写了两部自传体小说。但是,许多论文在对他的自传体小说使用第三人称叙述有许多解释和猜测,却没有注意到,在自传体中使用这种策略是库切特意冲击“虚写”和“实写”,留给读者的是接受者的自主性判断,这是对传统传记的书写方法的一次革命性的实验。即使他的非自传体的小说,也有许多暗合的自传体元素,这一现象至今没有被研究者所重视。笔者认为,其实这更是库切的一个书写策略,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虚构与非虚构的结合。

赵白生先生在《库切的三个背景》中的开篇用近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与传记文学有关,从而引入库切也写传记,“跟他们一样,也写自传。不同的是,他有点特别。除了写自传之外,他还专门研究自传,靠教自传自娱娱人”(299)。似乎得出结论:他看了伯切尔的两大卷游记,“他也要写一本这样真实的书。”文章中还引用了角谷真知子对《少年时代》(即《男孩》)的评论,认为之所以库切选用第三人称写自传,因为“自传是派生的,附属的,实际上只是起到了一种背景作用,它是小说的背景”(299)。赵先生一方面批评角谷真知子忘却了纪实作品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实际上也采纳了这个“背景性写法”的说法,把它作为库切的三个背景(家庭、社会、国际)讨论的基础。文中这个引用,笔者其实认为这里有一定的误读:“他也要写一本这样真实的书。当然,……描写这些南非的细节并非难事。‘难的是,给整体赋予一种氛围:真实的氛围。正是这种氛围,让书走上图书馆的书架,因而进入世界历史’”(299)。

笔者并不赞同说库切将这种背景写法作为“秘不示人”的利器。这实际上是将虚构与真实交织的写法来挑战传统。只有体现了真实的氛围,他的书写才能真正走向“图书馆的书架”,才能实实在在地“进入世界历史”。这段在《青春》中的表白,其实也是告诉人们,传记,包括自传,它的所谓“真实性”实质上与虚构密不可分:从脉络上也许是事实的表述,在细节上就不可能有绝对真实可言。何况事件发生之时所思所想的记载并非“即时性”,只能是后来的追忆和补充、甚至是虚构,其实所书写的就是书写时的“现在追思”。因此,作者大可以跳出来叙事,或者作为旁观者叙事,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还能有比选用“第三人称”更为合适的选择吗?而睿智的库切在多种场合下都声称《少年时代》和《青春》的确是自传体小说。这样,将更加使一般读者确信其“自传性”,而且通过他提供给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的简历相互佐证,阅读者也就更加深信不疑了。这样,真实性的氛围的营造才大功告成。因此他的自传体小说第三人称的选用,实质上是向你表白,你正在阅读的文本已经使你陷入了“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如历史叙述的大网之中。

1984年,库切就任南非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主任,就职演讲的题目是“自传里的真实”;2003年,他执教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讲授的课程就有“自

传”。尽管笔者因资料的局限未能阅读到演讲稿和课程的细节,但从标题来看,结合库切在各种文论和访谈的观点,可以推断出演讲和课程中均有一定程度的对自传体内的“真实”的质疑。比如,库切在《自传与忏悔》一文发表时接受大卫·阿特维尔(Attwell)教授的采访,其中谈到了该论文出自重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库切对这两位小说家的倾慕十分明显,谈到描写“真实”时,库切说:

我阅读他们选择了他们自己的角度,即,除了颠覆世俗关于真实的怀疑论外,还按照他们用来讲述真实的权力,支持怀疑论的策略来支持他们(‘什么是真实?’)。我在他们的另类方式上认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同他们作为真正哲学思辨的作家,抑或作为具有哲思权力的作家,尽管这些‘思辨’总携带着错误的暗示。(243-4)

此后,在论文《自传与忏悔》<sup>5</sup>中,库切用43个页码的笔墨集中论述了“真实”问题,其中不仅讨论了作品的真实、人物的真实、作者的真实,而且还将“真实”(Truth)分解为“他者真实”(the Other truth)、“意识真实”(conscious truth)、“无意识真实”(unconscious truth)、“深层真实”(deeper truth)、“高层真实”(higher truth)、“内在真实”(inner truth)、“外在真实”(exterior truth),等等。再比如,在另一部文集《陌生者的海岸》中,发表了库切通过研究传记作家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创作的惶惶五大卷《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而写成的论文《<不可思议的岁月>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生活及传记作家的写作真实意图时,库切指出:

弗兰克尽管是一个传记作家,但他只写文学传记,好比他早在第一卷的序言中就告诫读者:“想在以下的内容里寻找一篇传统传记的人将会非常失望…。我不是从生活写到作品,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目的是释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第二卷修改了这些相当朴实的目标。弗兰克承认在第二卷里他实际正努力做的就是将传记和社会文化历史与文学批评融合在一起。(124)

弗兰克“只写文学传记”,他的目的是“释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换句话说,那是他的主观阐释,而非描写对象的真实。“在书中传记的几个章节里,读者找不到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的文字”(125)，“弗兰克更大的目标是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背景——一方面是个人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历史、文化、文学,和哲学的——他成功了”(126)。

库切的另一篇论文《论多丽丝·莱辛和她的自传》在阐述这一观点时,也有明确的表述,而且认为作家自传的目的并非表现真实。这里谈及的虚构的小说

与自传的关系。莱辛认为历史之舟是由比意识更深层的潮流所推动的——深沉节奏的假设便是一个略显古怪的例子——这种观点在她的自传中不断重现。“当前自传计划面临的问题之——她也很好地认识到了——即相对于推论性的自我分析,小说有更好的方法去应对无意识的力量。”“因此完成自传计划的四分之三后,她以小说家而非传记作家的身份,发表了结论;“毫无疑问,小说能够更好地展现真实”(241)。而对于莱辛自传的真实目的,库切指出:

莱辛的生活有相当的公众性和政治性,因此对于那些“选择保持沉默”不写回忆录的人她自觉很是佩服。那么她的自传用意何在?她的答案很坦率:“自我辩护”。至少有五部自传已在计划之列。“你试图通过写自传来言明自己的生活”。(240)

库切对传记的研究涉及很广泛,除了上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研究、对《莱辛的自传》研究之外,还有对里尔克(Rilke)的研究、对达芙妮·鲁克(Daphne Rooke)的研究、对布莱顿巴赫(Breytenbach)的回忆录的研究,等等,而在2007年新出版的文集《内部的工作:2000-2005文论集》中还有对威廉·福克纳的传记的研究(189)。

从另一方面看,正如莱辛所言,虚构的小说或许更能够展现真实。库切在他的虚构作品中却大量地展现了他自传性的暗合。首先,库切的早期作品《雅格布·库切之讲述》,著作“翻译者”的署名用自己的真名,原文作品编著者的署名是“译者”的父亲(实为虚构)。这部小说,单从标题来看,所有读者会以为这是作者库切先祖的真实叙述,其中史料似乎是南非开普敦开拓的真实历史。(当然,当库切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图书馆读到这一史料时,库切本人都以为这是他的先祖的记述。)而且在叙事手法上,库切使用了第一人称更是似乎历史真实的再现;文中使用的是英语的现在时态进行叙述,这样,他没有把叙述定格在历史的时间上,却使读者以为是正在发生的事件。其次,在另一部虚构小说《耻》中,主人公的南非白人后裔的文化身份、文学教授的职业特征、故事的地点场景选择在开普敦大学、主人公的年龄及离婚的背景,甚至情爱经历都与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暗合现象,但它确实是部虚构作品,作者从来没有表示过有什么自传色彩。除去上述两部之外,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这部半虚构作品中,如前文所析,也表现出了这种暗合。而《彼得堡的大师》以其传记为素材,则更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与虚构的交织表述,这已经是公认的且不言自明的结论。

库切本人也曾多次指出:“因为从广义上讲,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自传;不论是文学评论还是小说,你写的每一样作品都在被你书写的同时又在书写着你本人”(17)。这是库切在接受南非威特沃特斯维大学(现为约克大学)的大卫·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教授采访(被收入《双重视角》)中,谈到他的作品与文论的关系时说:“不论他的创作的作品还是所写的文论都是在‘讲事实’的表态,同样

适合于佐证他的自传体文本和非传记性写作。

### 三、语义的模糊性与经典的互文联想

语言的语义常具有不确定性,文学言说的双重困境就在于“言”和“意”之间转化存在矛盾。“语言本身固有的含义常遮蔽了意义的表达;同时,先于个体存在的语言对思维也进行一定的限制。”(孙文宪 48)这种语言原本固有的含义常常通过文字的呈现向读者“播撒”着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与习俗、乃至个人经验等诸方面的“能指”,他与书写者所要表述的“所指”永远无法弥合。库切,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深知语言的语义的多义性和“能指”的不确定性,并恰当地运用这一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既让读者产生了与经典的互文的联想,将经典铺设为叙述的背景,又暗含了对经典的重述与解构、对历史的批判与颠覆。

利用了语义的不确定性,库切在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的书名的选用上别具一格,只要通过认真地分析,不难看出这一策略所带来的巨大好处。1986年,库切取材《鲁滨逊漂流记》,写成的小说《福》(*Foe*)。“foe”的字面原意是“敌人”、“仇敌”。从书名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反讽意味。鲁滨逊是英国或者说是欧洲早期殖民者的代表形象,当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efoe)是把鲁滨逊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塑造和颂扬的。但是,这个经典,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鲁滨逊是个殖民英雄,所以也就是殖民地人民的对立面——敌人。也就是说,笛福通过文学给人们塑造了一个形象,同时也给殖民地人民施加了一个敌人——鲁滨逊只是一个给殖民者带来幸福的人,他给被压迫民族带来的是失落、痛苦与不幸。所以库切要解构这个笛福创造的敌人形象。在英语的语义中,De作为前缀,含义是Down,有“下”、“取下”、“拆下”、“打倒”等含义。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De”加上“construction”,新造成“deconstruction”表达“拆解”、“解构”之意。从字面意义上来看,“Defoe”一词可以理解为“解构敌人”或者“剥下敌人的伪装”,使他显露出本来的面目,成为赤裸裸的敌人(foe)。更加发人深思的是,Foe又恰好是笛福的本来姓氏。在日耳曼语系中,De置放在姓氏前是有贵族身份的,在英法等国中比较常见(比如保罗·德·曼的原文是Paul De Man)。这就使人会产生更多的联想,对经典的联想、对作家权威挑战的联想、对鲁滨逊这个叙述史上的“英雄”神话原型解构的联想等等。

从另外一部小说《耻》(*Disgrace*)的命名,则更能看出语言大师巧用语义的不确定性这一策略。首先,将Disgrace书名译称《耻》是有根据的,张冲教授在他的论文《越界的代价》中详细地论证了这一观点。正如本论文第一章中所述,国内外的许多研究也都是围绕“耻”的这一主题展开论述的。因研究库切而著名的德里克·阿特里杰教授在他的研究论著《库切及阅读方法:事件中的文学》中也认为书名的意义应该确定在“耻辱”的语义上。他说:“Disgrace一词的反义词可对应为‘荣誉’(honor),因为《牛津英语辞典》关于Disgrace一词的解释总会

和 dishonor 相联系。换言之,公众目睹的耻辱与公众的尊敬相对应,也只能由公众的尊敬来抵销,只有通过荣誉才能挽回耻辱”(Attridge 178)。可是,当我们看到拉什迪的小说 *Shame* 也译为《耻辱》时,仅从中文译名来看其中的差异无法辨别。其实,语言从一种文字译为另外一种文字时,伴随着翻译同时就已经消失了许多东西:它暗含的文化、它暗示的隐喻、它原有文字的历史沉淀、甚至原来文字中的音韵所携带的美,等等。这在诗歌的翻译中多有论述。从构词法上分析,disgrace 一词由两个部分组成:dis 和 grace。Dis 表示“分离”、“离开”、“没有”、“失去”等含义,如 disconnect(断开连接)、discord(离心离德)等等(李平武 16)。而 grace 则通常意义是表示“优雅”、“文静”,“体面”、“情理”、“宽厚”、“仁慈”等等,而这些意义都通过 dis 这个词缀解构了。在西方社会,以基督教为主体的人群几乎每餐饭前要做的就是 say a grace(做祷告,做感恩祷告),这里 disgrace 可表示“没有了感恩”之意,或者“失去了仁慈”之意。如果结合作品的叙述,从深层次的寓意上分析,白人和黑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谁对谁应有感恩?谁对谁应该仁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描写的就是一个“没有了感恩的”、或者是“仁慈的缺失”的状态。库切在《双重视角》里曾经定义过“grace”：“grace 是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真理可以被清楚且不自盲目地讲出来”(392)。从库切这个意义上说,Disgrace 就是一种没有真理的、没有了感恩的、没有了体面的混沌状态。在《耻》中,主人公卢里在拜访女学生的家长时也说,“我陷入了一种 disgrace 的状态不能自拔,”“对于上帝来说,我这样永无止境地生活在 disgrace 状态之中,惩罚是否已经足够了?”(172)

这种发散的语义还表现在作品的人物的命名上面。前文谈到了作品暗含的真正主人公露茜的命名问题。卢里是按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笔下“露茜”为女儿取名的(Belling 46)。诗中露茜所抱有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无奈的结果。从作品为她命名的意图,似乎可以看出她必将成为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用自然主义哲学处世的人,也许同华兹华斯笔下的“露茜”同一命运。但是到最后,卢里放弃了一切,包括他的女儿、他对正义和语言的看法、他创作拜伦史诗剧的梦想、对濒死动物的爱,甚至自己的思想。这种与华兹华斯的互文联系,在作品中即有交代。另一个人物梅兰妮(Melainie),Melanie 与 Melody 同音,意为“美妙的旋律”,这里代表文人对“美妙的旋律”的诗性追求(后文详细论述)。当我们把梅兰妮的姓 Isaacs 和大卫·卢里的姓 Lurie 联系起来,Isaacs Lurie 与十六世纪犹太神秘主义者和希伯来学者 Isaac Luria 谐音。该学者关注的就是人的原罪和灵魂的救赎(王敬慧 66)。通过作品的人物,库切还实现了与另外一个南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戈迪默的小说《六尺乡土》(*Six Feet of the Country*)的互文。在《耻》中有一个阴影式的人物,他的意志似乎左右着真正的主人公露茜的思想和抉择,这个人物甚至控制着事态的发展,他抑制了卢里的报复冲动,包庇着少年黑人罪犯,最后竟然使露茜甘愿嫁给他以寻求保护和生存,将她的土地也划归到他的名下。这个人就是曾经是露茜的帮工——黑人佩特鲁斯(Petrus)。但在戈迪默的《六



尺乡土》中,佩特鲁斯是一个黑人工头。由于处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他如同其他被殖民者一样失去了土地、身无分文,甚至无法安葬逝去的亲人,受尽了白人统治者的凌辱。在《耻》描述中的后种族隔离时代,佩特鲁斯彻底翻身了。他不仅可以买地、置房、跟白人做邻居,甚至还能让殖民者的后裔甘愿“归还”被他们“占有”的土地,直至占有她的身体,而且还是当他的第三个老婆。这正如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所说的,“从历史上看,我们知道黑人犯了同白种女人睡觉的罪是要被阉割的”(53)。而现在的佩特鲁斯则得到了“满足制服欧洲女人并带有某种骄傲的报复味道的婚姻”,“在一个欧洲女人身上为她的祖先几个世纪以来使我的祖先所遭受的一切雪耻报仇”(52)。

库切的其他作品也都有这个特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典具有一种互文关系。比如,《等待野蛮人》与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同名诗作及贝克特《等待戈多》的互文关系,以期再次“揭示现代文明理性下的虚伪”(He and His Man 12)同时还与殖民书写的作品吉卜林(Kipling)的《地区长官》(The Head of District)形成了对应关系。1977年出版的《内陆深处》与康拉德的名著《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也形成了互文关系。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黑非洲的心脏地带,另外是指文明人即殖民者来到非洲之后,从外到里进行掠夺,并从精神上进行腐蚀的行径。《内陆深处》中的非洲还是那个停滞不前的非洲,移民者毫无生气地定居在被冷落的边缘地区。其他作品如《彼得堡的大师》构成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和他的著名小说《群魔》的互文关系,《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构成的与卡夫卡的《城堡》、《审判》等的互文关系,等等,对于一般读者只要稍微留意便不难看出。

### 注解【Notes】

1. *What is Realism?* Bennington, Vt. : Bennington College, 1997 该单印本出版之前,本文曾发表在《杂录杂志》(*Salmagundi, nos*)1997年114-115。
2. 《小说在非洲》是1998年11月11日库切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多琳·B·汤森德人文学科中心的邀请,以尤纳讲座基金获奖者的身份为该校的师生及研究生所做的演讲,此文后来于1999年发表在伯克利分校汤森德中心(Townsend Center)主编的杂志《文词偶得》(*Occasional Paper*)第17期上。
3. *The Lives of Animal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my Gutmann.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 Press, 1999.
4. *The Humanities in Africa =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 Afrika*. München: 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 Stiftung, 2001(慕尼黑:西门子基金会)。
5. 原论文题目是《忏悔与双重思想:托尔斯泰,卢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入文集《双重视角》后,编在了《自传与忏悔》的栏目下,参见该文集第240-293页。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ttridge, Derek. *J. M. Coetzee and Ethics of Reading: Literature in Ev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 凯尔纳 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 [Kellner, D. & S. Best. *Postmodern Theory*. Trans. Zhang Zhibin.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4]
- 北塔:“译后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库切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82页。
- [Beita. “Postscript of Translation.” *Elizabeth Costello; Eight Lesions* by Coetzee.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s Press House, 2004]
- Belling, Catherine. “On J. M. Coetzee's Disgrace.” *Literature Annotation*, 2 (2003): 46-49.
- Coetzee, John Maxwell.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1999.
- . “Dostoevsky: The Miraculous Years.” *Stranger Shores: Literary Essays 1986-1999* (New York: Viking, 2001): 114-26.
- .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avid Attwell.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Elizabeth Costello; Eight Lesion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2003.
- . *He and his Man; The Nobel Lecture in Literature 2003*, London: Penguin 2004.
- . “The Autobiography of Doris Lessing.” *Stranger Shores: Literary Essays 1986-1999* (New York: Viking, 2001): 232-48.
- . “William Faulkner and his Biographers.” *Inner Workings: Literary Essays 2000-2005* (New York: Viking 2007): 189-206.
- 法农,弗朗兹:《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 [Fanon, Franz. *Black Skin, White Mask*. Trans. Wan B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 Liotard, Jean-Francois. “The Unconscious, History and Phrases: Notes 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ew Orleans Review*, Spring(1984): 73-79.
- 孙文宪:“语言的痛苦:文学言说的双重困境”,《湖北大学学报》,2(2002):48-54。
- [Sun Wenxian. “The Significance of Languag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peaking and Meaning.”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2(2002): 48-54]
- 李平武:《英语词根与单词的说文解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
- [Li Pingwu. *English Roots and Words Interpretation*.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1984.]
- 王敬慧:《永远的异乡客》,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 [Wang Jinghui. *Foreigner Forever: On Postcolonial Diaspora Perspective in J. M. Coetzee's Writing*. Dissertation of Beijing Language University, 2006.]
- 赵白生:“库切的三个背景”,《世界文学》,2(2004):299-310。
- [Zhao Baisheng. “Coetzee's Three Backgrounds.” *World Literature* 2(2004): 299-310.]

责任编辑:杨革新